

上 编

人类历史进入 20 世纪后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重大进展之一就是出现了建立在科学技术发展基础上的大众传媒,环绕着大众传媒而膨胀起来的文化从传统的贵族特权转变成文化工业,并直接促使消费社会的出现,对此变化,20 世纪上半叶兴起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着深刻的体验。

20 世纪初,受到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加上世界大战导致国内矛盾的加剧,从 1918 至 1923 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普遍掀起了工人阶级革命的高潮,芬兰、德国、匈牙利等国都发生了革命,但最终都失败了,西欧工人运动陷入低潮。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总结经验教训时,作出了自己的解释,他们一方面对苏联当时实行的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不满,另一方面也认为西方国家的国情与俄国不同,不能照搬俄国十月革命的老路。由于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不同于第二国际、也不同于第三国际的解释,所以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马克思主义”。

早期的新马克思主义者总结革命失败的原因,几乎都认为西方 20 年代革命运动的客观条件完全具备,失败的根由就在于主观条件的不具备,缺乏相应的心理前提和思想准备,对资产阶

级的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导权重视不够,无产阶级没有能够摆脱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影响。正因为这样,新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第二国际的“经济决定论”,高度重视无产阶级的主观能动性,重视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新马克思主义兴起的客观形势决定了他们关注的问题集中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他们把革命斗争的问题归结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问题,把政治实践归结为文化批判。

20世纪初,社会的统治和控制机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再直接简单地表现为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资本主义国家的两种国家机器:强制性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都加强了力量,尤其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社会各种力量被异化的文化所整合,借助文化工业,形成一种新的统治形式,这种形式使得统治变得无所不在,更重要的是乐于为人们所接受。在新的社会统治形式下,人在完全是自己的文化创造物的属人世界中,表面上是自由的,实质上从生产到消费,从工作到私人生活甚至无意识均受到无形的异己的文化力量的摆布。

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经济生活中劳动率的提高使人类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走出了物质匮乏的威胁,这是20世纪人类文明所取得的最显著的成就。然而这种进步却表现为一种畸形和片面性:富裕的物质生活与贫乏的、缺少批判性的精神生活,人成为单纯的经济动物,生产的高效率被设定为社会发展的最高目标,甚至人的心理生活、情感活动也丧失了独立性,成为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控制物。

面对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这些新变化,新马克思主义者从

不同的方面对其进行了分析和批判,本编主要以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霍克海默、阿多诺、本雅明的文化工业理论及马尔库塞关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为主进行分析和阐释。

第一章 法兰克福学派的 大众文化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因其主要成员都曾在德国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过而得名,它是新马克思主义思潮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前后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派别。1930年,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 1895—1973)接替患病的格律伯格担任社会研究所所长,从此开始了以社会批判理论而著称的法兰克福学派历史。霍克海默为社会研究所重新确立了研究方向,这就是研究“社会哲学”,并制定“社会批判理论”作为“社会哲学”的理论基础。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对大众文化的研究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早在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在对大众文化和传媒对社会及意识形态的影响研究中,就创造出“文化工业”一词来指代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工业化过程及推动该体系的商业机制。文化产业的特殊功能,既加速了现存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合法化,又驱使个体融入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中。

第一节 文化工业的内涵

“文化工业论”是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中最独特、最

重要的理论,法兰克福学派反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模式来分析文化现象,也反对传统的文化主义把文化看做是一种脱离社会总体性的孤立形式,而主张在政治和思想的层面上对文化进行剖析,尤其是他们看到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巨大影响,把大众文化与政治联系起来,试图挖掘隐藏在大众文化背后的政治—意识形态因素。他们提出“文化工业”这一术语,用以指称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西方统治阶级通过这种文化的兜售,占据人们的闲暇时间,通过娱乐来实现对大众的欺骗,从而操纵广大群众的心理与思想,培植支持统治阶级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

一、大众文化的兴起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流派那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早期的大众文化是指非精英的文化,非精英是一大批或多或少可以确定的社会群体,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工匠、农民及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无产阶级。在某种意义上,大众文化是指在一定时期多数人所拥有的共同的行为习惯和生活方式。

16至18世纪的欧洲,社会等级森严,分层鲜明,与社会分层相应的是文化的分层,少数人能读会写,大多数人目不识丁,社会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 Redfield, 1897—1958)指出,在这种社会内部并存着两种文化传统,一种是受过教育的少数人的“大传统”,另一种则是其余人的“小传统”。

大传统是在学校或教堂里培植起来的;小传统则是自

生自长的,并在文盲充斥的乡村共同体的生活中保持自己的存续……这两种传统相互依存。大传统和小传统长期以来相互影响,而且将继续相互影响……伟大的史诗产生于众人所讲的故事中的传统要素,并重返到农民中间去修改并融入到民间文化中去。^①

这种小传统就是大众文化,包括民歌、民间故事、神像、神秘剧、滑稽戏、宽幅书和小歌谣集,还有一些重要的节日,如圣诞节、元旦、狂欢节等。

这两种传统中间并没有一道鸿沟,上层阶级或受过教育的人对大众文化也很热衷,他们参加狂欢节,欣赏民间艺人的表演,爱好民歌,还有一些贵族为民间艺人提供庇护。然而,上层阶级的人参与大众文化并不意味着两种传统是平等的,精英参加了小传统,但平民并没有参与大传统,今天我们所知的欧洲近代文化主要是大传统,它包含学校和大学里传承下来的古典传统,以及文艺复兴、17 世纪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等。

早期大众文化的传播主要是依靠四处流浪的歌手和演员,一些画师、雕刻家和编织师这些职业艺人,表演艺人像流动商贩一样,从一个地方游历到另一个地方,为了得到新的观众,他们必须不停地迁徙,从这个市镇走到那个市镇,从这个集市走到那个集市,哪里有观众,就在那里演出,大众文化的中心是旅馆、酒馆、啤酒馆及城市的中心广场。

18 世纪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重要变化带来了文化上的后果,首先就是人口的增长,人口的增长导致了城市化。欧洲内部

^① 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 页。

的贸易以及欧洲与世界上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有了很大的扩张,商业资本主义发展迅速,与商业革命相伴随的是交通革命,建造了更多人的船只,改良的公路。经济上的变化带来了贫富两极的分化,大众文化也发生了变化,一方面商业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使得大众获得了更多的文化产品,如彩绘家具;另一方面市场的兴起意味着需求的增加,为了满足需求,生产过程逐渐变得标准化起来。以往来自大众的具有自发和分享特征的娱乐形式已经逐渐转变为以正式的方法组织起来的和商业化的供观众观看的娱乐活动。

在向农业资本主义转变的漫长阶段,以及其后工业资本主义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劳动者的文化或长或短地持续着斗争,1500至1800年,民众态度的另一个重要转变可以称作大众文化的“政治化”,或者说政治意识的传播,尤其是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16世纪20年代出版了许多劝说普通民众的小册子,有的说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是正确的,有的说他是错误的,讽刺读物把各种观点带进了每家每户,德国农民对这场辩论作出的反应是1525年举行的大起义。马丁·路德从不主张农民起义,但是这场宣传运动确实鼓起了他们对教会地主的不满。他们的不满有许多是传统的,但是从宗教的角度使他们的起义合法化却是崭新的做法,使他们得以利用更高的权威去攻击地主和亲王,甚至使他们有可能对皇帝进行批评。

在中欧30年战争期间(1618—1648),一种新的媒体——报纸出现了,报纸的出现,使得大众对政治的兴趣大增,国家事务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更紧密了,这种新出现的媒体并不受统治阶级的喜爱,他们认为“看报会让群众对他们的管理者的行动和讨

论了解过多,过于关注现实,吹毛求疵,看报不但给了他们干涉政府的愿望,而且给了他们这样做的一种貌似有理的权力和认可”。^① 汤普森(E. P. Thompson, 1924—1993)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道:维多利亚时代中等阶级的敏感是在18世纪90年代由那些看到矿工、陶工和刀匠们在阅读《人权论》时被吓坏的乡绅培育而成的。那时潘恩的《人权论》被缩写成6便士的小册子大量发行,当时有一封信是这样描写的:

伯纳德城堡中有大量的人对宪法表示不满,诸如“不要国王”、“自由”和“平等”这样的口号写在市场十字路口。不久前希尔兹和桑德兰的船工骚乱时,他们向兰布顿将军问道:“你读过汤姆·潘恩的小书吗?”“没读过。”“那么就读读它,我们很喜欢它。将军,你拥有大量财产,我们很快就会把它瓜分掉。”^②

19世纪上半叶,大多数人所受的正规教育并没有超出读、写、算的范围,但具有初步读写能力的散工及工匠自学的热情很高,他们的书籍和教员常常是宣扬改革的,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活动,工人们形成了有组织的社团。在工人的斗争中,报纸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那些版面小、排版密、价格便宜的报纸,经常刊登工人人们的伟大斗争,使得不同地区的工人认识到,还有其他地区的人们和自己一样在行动。

可见,“大众”这一术语与“阶级”这个术语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增加了这一术语的混乱,有时我们谈论

① 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326页。

② 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工人阶级文化的特殊形式,却用“大众文化”这个更有包容性的术语指称研究的一般领域。到底什么是大众呢?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 1932—)给出了三种定义:(1)事物被称为“大众的”,是因为成群的人听它们、买它们、读它们、消费它们,而且似乎也尽情地享受它们;(2)大众文化指“大众”做或曾经做的一切事情,这接近大众概念的人类学定义:“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这是个描述性的定义;(3)大众文化体现在大众传统和实践之中,在任何特定时期,这个定义关注的都是形式和活动,这些形式和活动以特定阶级的社会和物质条件为基础。^①

在19世纪与20世纪的思潮中,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基本上是对立的,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批评工业社会的生活实在是单调无趣,高雅文化受到威胁,此时的文学作品每况愈下,作者竞相设法让人惊艳而不是愉悦;撩拨人的热情而不是激发人的品位,民主理念转成社会与文化上的意义,就是平庸。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22—1888)认为,文化是:(1)认知什么是最美好的能力;(2)美好事物;(3)心灵和精神上对美好的运用;(4)对美好事物的追求。他对当时文化上的混乱现象极为不满,他用“无政府主义”来概括这一现象,认为工人阶级是粗野的、暴力的、没有教养的,他说:“工人阶级……粗鲁,没有开化……长期生活在贫穷和肮脏之中……现在从他们的藏身之处跳出来,主张建立一个他们能为所欲为的崭新的英国人的特权天堂,于是他们游行、集会、呐喊、胡闹。”^②克服这种

① 陆扬、王毅:《大众文化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47—50页。

② 约翰·斯道雷:《文化理论与通俗文化导论》,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

无政府状态靠什么呢？阿诺德认为要靠文化，靠文化把美好的东西灌输给工人阶级，使他们懂得服从秩序，服从权威，文化就是要控制大众社会里不守规矩的力量，这种文化当然是“高雅文化”。这样一来，大众文化就与底层民众紧密联系起来，大众文化更多的指那些和统治阶级对立的、从民间自发产生的、自娱自乐的文化。

然而，对于法兰克福学派来说，他们所谓的大众文化具有完全不同的含义，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并不是一种从群众自身中自发产生的文化，而是特指兴起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借助于大众传媒而流行于大众之中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种大杂烩，是由上而下地强加给大众的。以往大众文化中的“大众”所指的主体群体——“人民”发生了很大改变，他们已经丧失了任何主动性、创造性，成为受到大众文化操控的原子式的个人。

二、启蒙理性与“文化工业”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大多数是犹太人，他们深受法西斯主义的迫害，背井离乡，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深恶痛绝，并对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在德国大众中的流行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and 探讨。他们认为法西斯主义之所以能够取得统治地位，大众的心理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大众心理受到文化工业制造的意识形态影响，因此，他们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大众文化或文化工业与法西斯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上，试图搞清楚意识形态、大众心理和大众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大众文化对人们心理的控制，试图通过揭露虚假意识形态对群众的欺骗来找到唤

醒群众的道路。

法兰克福学派的所谓意识控制并不是一种政党的意识形态,或者来自传统或权威的思想观念,而是启蒙理性自身铸造出来的一种精神,是一种形式化、数量化、效率化和规制化的思维方式,即工具理性,并把工具理性作为理解世界的唯一方式,启蒙理性倒退为工具理性,文化工业与工具理性关系密切,或者说是工具理性的产物。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启蒙”与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与得逞联系在一起,认为“启蒙的妄想狂在法西斯主义、反犹太主义中达到了顶峰”,强调法西斯主义是“启蒙精神的自我摧毁”的必然结果。

什么是“启蒙”呢?霍克海默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1903—1969)说:“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要消除这个着魔的世界;取缔神话,用知识代替幻想。”在他们看来,培根这位“经验哲学的始祖”已经阐明了启蒙运动的目的,因为培根坚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总是傲岸不屈的”,“人的理智与事物的本质是协调的”,“人的理智能战胜迷信,控制自然”。然而,启蒙的结果却是工具理性战胜了一切,启蒙走向了反面。

今天,人性的堕落与社会的进步是联系在一起的。经济生产力的提高,一方面为世界变得更加公正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让机器和掌握机器的社会集团对其他人群享有绝对的支配权。在经济权力部门面前,个人变得一钱不值。社会对自然的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一方面,个体在他使用的机器面前消失不见了,另一方面,个体又从机器那里得到了莫大的好处。随着财富的不断增长,大众变得更易于支配和诱导。社会下层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时

候,付出的代价是社会地位的下降,这一点明显表现为精神不断媚俗化。精神的真正功劳在于对物化的否定。一旦精神变成了文化财富,被用于消费,精神就必定会走向消亡。^①

因此,启蒙理性是一个自我毁灭的过程。启蒙理性的精神是“工具理性”,它用分析方法找出因果关系,以便实现对自然、社会 and 个人的控制。所谓工具理性,指的是围绕着目的的合理性行为即技术实践所形成的一整套基本文化价值,它把一切都标准化、计量化,从而消灭了一切异质的东西。工具理性的对象化体现在物质生产中,使生产力不断增强,体现在精神生活中,就是文化工业的出现,从“工具理性”出发,法兰克福学派批判了“文化工业”。

霍克海默与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中首先提出“文化工业”的概念,他们到美国后,对这个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科学技术的威力深有体会,但他们最关注的还是科学技术带来的“工具理性”的负面作用。他们认为,启蒙的根本目标本来是要使人们摆脱恐惧,结果却造成了“工具理性”至上,科学技术反过来操纵了自然和人,使人类重新堕入不自由和受管制之中。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使得知识本身仅仅成为一种工具,人们从自然中想学到的就是如何利用自然,以便全面地统治自然和他者,而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利也在逐步增长,最终,启蒙抹掉了其自我意识的一切痕迹。

个人只是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物,一种统计因素,或是一种成败。他的标准就是自我持存,即是否成功地适应他职

^①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页。

业的客观性以及与之相应的行为模式。其他一切事情,不管是观念,还是罪行,都受到集体力量,受到从班级一直到工会这些集体力量的监控。但是,连具有威慑性的集体也只有骗人的嘴脸,而它根子里却隐藏着把集体操控为权力工具的权力。^①

但这种表面上看起来民主的集体也是骗人的,它实质上体现着权力,这种权力野蛮地把个体拼凑起来,全然不能体现出人的真正本质。

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和生产手段,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原因,但是,它在创造强大的生产力的同时,却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最终,启蒙在为现实社会服务的过程中,逐步转变为对大众彻头彻尾的欺骗。

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表现出的敌视和忧虑,主要与他们把文化工业看成是意识形态有关。法兰克福学派见证了德国纳粹如何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工具来奴化人民接受其法西斯文化和社会的统治,因此,他们认为文化产业成为使工人阶级融入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一种方式,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作为新的意识形态控制着人们的思想,消解了批判的向度。

在他们看来,大众文化整体上是一种大杂烩,是由上而下地强加给大众的。正是这种大众文化,在现代大众媒介和日益精巧的技术效应的协同下,一方面极力掩盖处于严重异化社会中的主体—客体关系之间矛盾的性质,另一方面则大量生产和复制千篇一律的东西来不断扩展和促进大众文化的标准化和情感

^①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体验的标准化,有效地助长了一种精于包装的意识形态,使人们更加适应于习惯性的统治,最终把个性无条件地沉淀在共性之中从而导致了生活方式的平面化、消费行为的时尚化和审美趣味的肤浅化,正像阿多诺所说:

文化产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它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们快乐,而这个承诺却从来没有兑现;实际上,所有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它能够确定的就是,它永远不会达到这一点。^①

而在这一过程中,文化的诸多形式有利于塑造引导个人去适应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环境的思想 and 行为模式,文化工业取得了双重胜利:在外部消除了真理,又在内部用谎言把真理重新建构起来。

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文化工业就是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已经渗透到日常经验的每一个角落。大众文化已经消除了文化原有的批判和否定的向度,堕落成为为现实和统治辩护的意识形态工具。霍克海默和阿多诺举卡通片为例,他们认为,人们曾经一度用卡通片来对抗理性主义,因为卡通片可以使那些残缺不全的东西获得新生,从而保证这些被重新注入生命的生物或事物受到公正的对待。然而,今天,卡通片要做的就是让技术理性彻底战胜真理,它们会把教训灌输进每个人的大脑里:不断产生的摩擦,以及瓦解所有人的抵抗力,正是这个社会的生活条件。

文化工业对消费者的影响是通过娱乐确立起来的,文化和

^① 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6页。

娱乐的结合导致了文化的腐化,在自由不断扩张的年代里,娱乐是以对未来产生的不可动摇的信念为基础的,然而,娱乐所承诺的自由是摆脱了思想和否定作用的自由,是对最后一丝反抗观念的逃避,商业和娱乐的结合表明了娱乐的特殊意义:防范社会。

文化的这种遮蔽性和控制性表明文化最终是以服务于意识形态、实现意识形态的辩护功能为最高价值取向的。资本主义生产从身体和灵魂上都对工人、雇员、农民等进行控制,文化工业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幻象,让人们的不满通过消费文化商品充分发泄出来。“风格”在文化工业时代越发的多样、和谐和完美,然而,真正的艺术恰恰是不和谐的,形式和内容、内在和外在外在、个人和社会,对一致性的寻求会导致艺术作品的失败,于是,今天的文化商品,内容变得空洞,只剩下风格了,文化工业戳穿了风格的秘密:即对社会等级秩序的遵从。

文化创造了现实中并不存在的社会的幻想,这种幻想遮蔽了商品生产的物质条件,这种文化本身就是意识形态,而且既然意识形态始终反映出了经济强制性,那么不论在什么地方,对意识形态的自由选择也就变成了选择同一种意识形态的自由。

三、文化工业的内涵

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成员在 20 世纪 40 年代初移居到美国,美国是盛产大众文化的国家,这种盛产在 30 年代就已经成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1922 年,美国的广播电台发展到 383 家,全国收音机拥有量达 60 万台,1926 年,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成立,1927 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成立,1943 年美国广播公司也相

继成立,成为广大受众的主要新闻消息来源。广播在大众中的巨大威力很快就显示出来,出现了所谓的“火星星人进攻地球”事件。1938年10月30日万圣节前夕,美国一家电台播出了一出广播剧,由著名演员播出威尔斯的小说《世界大战》,但其中用的都是当地一些真实地名。广播剧是按照新闻报告的形式写成的:先是以一段音乐开始,中途突然插播新闻报道,报道称:火星星人进攻地球,登陆点就是当地的市中心。几分钟的时间里,收听广播的数万名观众都相信了这一“事实”,惊慌失措。电台为了制造出逼真的效果,特地请来了“专家”和“目击者”作证,生动地向听众描述火星星人降落地球时的景象。播音员直播式地解说:火星舱降落地球了……舱门打开了……7 000人合击火星星人,只有120人生还,看……碎尸遍野,血流成河……在一小时节目中,虽然播音员先后几次声明节目内容是虚构的,但惊魂未定的人们仍坚信这一事件是真的,有人去教堂祈祷,有人奔上街头,企图用湿毛巾挡住火星星人的毒气,也有人端起猎枪去搜寻入侵者。事后据普林斯顿大学的研究机构调查,约600万人收听了广播,约100万人相信。

1936年11月2日,英国广播公司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座电视台,开始正式播送节目,标志着声响并茂的电视媒介的正式诞生,40年代美国出现了彩色电视机。除了广播与电视外,美国的电影业也是发展迅速,1889年科学家托马斯·爱迪生发明电影,1926年,电影业就与汽车业、罐头业、石油业、钢铁业、烟酒业并驾齐驱,成为六大产业之一。这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来到美国时面对的大众文化格局。

“文化工业”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提

出的一个重要概念。他们指出,所谓的文化工业是指凭借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大规模地复制、传播文化产品、文化商品的娱乐工业体系。这种娱乐工业产生于发达资本主义工业国家,它以制作和传播非创造性的、标准化的大众文化商品为手段和载体,通过独特的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电视、广播、报刊、杂志等多种普遍有效的途径送达消费者,供其消费,进而从中达到获取高额利润、实现发财致富的目的。依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这种大众文化就是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小说、流行音乐、叫座的影片、广告艺术、大批量生产和复制的艺术品等。大众文化实现了文化、艺术、宗教、哲学与商业、政治、消费、娱乐的有机结合,从而形成了物化的、虚假的文化,满足人们被动、虚拟的需要。西方统治阶级通过这种文化的兜售,占据人们的闲暇时间,通过娱乐来实现对大众的欺骗,从而操纵广大群众的心理与思想,培植支持统治阶级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

大众文化在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产生、崛起与发展,是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崭新现象,大众文化就是由文化工业塑造和支撑起来的消费型文化和消费主义取向。大众文化的出现是技术理性和经济力量侵入文化领域的结果,商业企业在新近觉醒的大众的文化需求中找到一个有利可图的市场,先进的技术使廉价地生产足够数量的书籍、图画、音乐和家具以满足市场成为可能。大众文化是一种媚俗文化,媚俗是艺术的当代形式。

媚俗俘获了所有艺术……当画家 X 或戏剧家 Y 为他的有备而来的观众生产出 X 的或 Y 的媚俗之作时。美国最好的诗人之一,多年来就没写过什么别的东西……无论是哪一种艺术,问题都不在于虚伪或欺骗,而在于放松肌